

老西寧

LAOXINING

叁

寺庙祠观追踪

靳育德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老西寧

LAOXINING

寺庙祠观追踪

叁

靳育德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西宁. 叁, 寺庙祠观追踪 / 靳育德著.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225-05188-8

I. ①老… II. ①靳… III. ①寺庙—介绍—西宁②祠堂—介绍—西宁 IV. ①K29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4451 号

老西宁叁

靳育德 著

出版人 樊原成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0971) 6143426 (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 6143516/6137731

印刷 青海西宁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20mm × 1010mm 1/16

印张 14.25

字数 190 千

版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5-05188-8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珍惜历史遗迹 守护千年文化 / 1

寺 / 13

现存寺院

南山寺 大佛寺 弘觉寺 法幢寺 东关清真大寺
金塔寺 北关清真寺 塔尔寺 西纳上寺 噶住寺
红崖沟寺 三塔拉寺 鲁沙尔清真寺 东科寺

扎藏寺 广惠寺 会宁寺 祁家寺 圆觉寺

上治泉清真寺 佑宁寺 却藏寺 白马寺 天门寺

夏宗寺 安家寺 拉干寺 洪水泉清真寺 央宗寺

已消失寺院

葆宁寺 铁佛寺 印心寺 永兴寺 南寺 九华寺

雷鸣寺 莫家寺 汪家寺 转经寺 普济寺 隆奔寺

刚岔寺 卡阳寺 阳霸寺 麻家寺 正觉寺 普现寺

老佛寺 觉化寺 仰华寺 西纳下寺

静房 /99

现存静房

曲噶尔静房 半截沟静房 静房湾静房

已消失静房

卡阳静房 群塔静房 奔巴尔静房

庙 /105

现存庙宇

西宁城隍庙 西宁文庙 刘琦庙 田家寨侍郎庙

湟源城隍庙 湟源文庙 北极山庙 老爷山庙

娘娘山(圣姥庙)

已消失庙宇

关帝庙 宣圣庙 都龙王庙 海神庙 吕祖庙

三圣庙 药王宫 旗纛庙 廐神庙 火神庙 马祖庙

福神庙 湟源关帝庙

祠 / 143

现存祠堂

马公祠 凤凰山拱北

已消失祠堂

蔡公祠 毛胜寺(祠) 八蜡祠 水土祠 风神祠 雷神祠

文昌祠 启圣祠 忠节祠 节义祠 乡贤祠 名宦祠

侯公祠 孟忠毅公祠 殷公祠 屈先生祠 杨公碑祠

刘参政祠 马军门祠 穆公祠 董公祠 昭忠祠(统领寺)

旌忠祠、旌节祠 萧曹祠

观 / 181

现存庵观

土楼观 南佛山庙观 岩岗寺(青岭观) 集福观

五峰寺庙观



古西寧

叁

目次 CONTENTS

已消失庵观

广福观 百子宫 北斗宫 甘露庵 广嗣宫 黄蒿台庙观

庆祝宫

教堂 /209

现存教堂

教场街基督教教堂

已消失教堂

兵部街天主教教堂

珍惜历史遗迹 守护千年文化

西宁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河湟谷地，达坂山、拉脊山纵横其间，四峡拱卫，三水合流，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正如清末西宁名士基生兰所说：“青光遍绕河湟地，碧色浑连日月山”，物华天宝，真是一块天造地设的洞天福地。数千年来，它以特殊的地理位置在青海文明史上，扮演了独特的角色，最终不但成了全省政治、经济、交通的中心，而且成了全省文化、教育的中心。

史载数千年前，“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先民）以狩猎为事”，自从西汉元狩二年（前 121 年）汉军进入湟水流域，到元鼎六年（前 111 年）设西平亭，之后又设临羌县，河湟地区始隶汉王朝的政治版图，“开辟湟中忆汉家，边城近海即天涯”，成了我省最早开发的地区。从元狩年间算起，到建安年间，经两汉 340 年的经营，在中原王朝的支持下，一些有作为的护羌校尉在任期间，移民屯田，兴修水利，使用铁器，推广水磨，河湟地区曾一度呈现繁荣景象，史载湟水两岸“桑麻翳野，宛如荆楚”。正如



蒲文成先生在《河湟佛道文化》一书中曾说：“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出现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历史现象”，在此背景下，传说早在东汉时期，就有汉僧从内地来到河湟地区，曾在今湟源西乡的莫尔吉沟口建起僧舍修行。蒲文成先生在《河湟通览》中也有如下记述：“（湟源）扎藏寺僧人口传，该僧禅修时建有禅房一间，后留下槟木念珠一串、大钵法器两个、刻有‘延康’（延康，东汉献帝年号，即公元220年）的象牙笏板一块和一双僧鞋，曾一度保存在后来的扎藏寺”。

“魏蜀吴，争汉鼎”，东汉灭亡后的300余年间，中原混战，群雄割据，政权频繁更替，前凉、前秦、西秦、后凉、南凉、北凉相继统治过今西宁等青海东部地区。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统治者之间相互争斗，倏尔兴盛，倏尔湮灭，民谣“秦州血没腕，只有凉州（包括西宁）倚柱观”，世事无常，人民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痛苦中都祈求有个“世外桃源”，能过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闲适生活。在这一背景下，寄希望于来世的佛教乘势发展，“流经西域，漫播中土”，各族建立的政权也把佛教作为加强统治的工具，极力推崇，在传播弘扬上不遗余力。加之河西走廊因战火而中断，正如《循化厅志》中所说：“自佛之来西域也，河湟实为首被教化之地。”由于河湟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连接地带，在几千年的社会变迁中，逐渐成为中原汉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的交汇地，又成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走廊，据《魏书·释老传》记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内地僧人前赴后继，西行求法者络绎不绝，西域僧人也不惧险阻，涉荒漠，渡流沙，东来传经授法。西晋武帝司马炎时，就有西域僧人到河湟，在当地人中传播佛教，还剃度了一位后来名“法护”者为僧。后来法护跟随其师到西域诸国学经多年，据《青海省志·宗教志》记载，法护掌握有36国语言，还在敦煌翻译出《光赞般若经》《维摩诘经》等约150部，共300卷，之后又回到河湟地区传播佛教。十六国时（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平阳郡僧人法显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从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往印度取经，曾途经河湟的乐都、平安、大通、门源、祁连扁都口，再从张掖沿河西走廊，穿越西域，逾葱岭，到

北印度一带游学。史载他们途中曾“行至僇檀国，度养楼山至张掖镇”。僇檀即建都乐都、西宁的南凉国第三代国主秃发僇檀，养楼山即达坂山。南凉虽建国只有短短的18年，但就在这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的18年中，秃发三兄弟选耆老，开办儒学；崇信佛教，延僧建寺，使佛教在河湟地区得到极大发展。据《河湟佛道文化》一书介绍，当年法显一行11人在南凉都城西平曾受到南凉主秃发利鹿孤和主持南凉军政大事的秃发僇檀的热情接待，被迎入寺院讲经说法，受到信众的欢迎和崇敬，临行时还再三挽留他，离开西平时还有僧人结伴随行。

南凉建和二年（401年）十一月，秃发僇檀还从西秦请来僧人昙霍，不但对他“厚加敬仰”，而且无论国事家事，都要与昙霍商量。在国主的影响下，于是西平百姓“事佛者日众”，昙霍“出入街巷，百姓顶礼膜拜”，被号为“大师”。

北朝时期，敦煌人宋云在京师洛阳出家，被拜为伏子统（僧职名）。北魏神龟元年（518年）冬，孝明帝派遣他率沙门法力等前往天竺取经，以宣扬国威，结好邻国。与此同时，受北魏胡太后之命，洛阳崇立寺汉僧慧生亦往西域取经。这时凉州正值战乱，河西道断绝，于是宋云等决定改行青海道，从兰州渡河，来到西平。他们在西平修整数天后，史载“西行四日至赤岭（今日月山），即国之西疆也，皇魏关防正在于此。”他们从印度取经返回时，仍沿羌中道，经西宁返回洛阳。据《青海省志·宗教志》记载，从晋武帝到北魏神龟250年间，竟有20批内地汉僧前往西域和印度取经。

此时，也有一些由西而东，经西宁前往内地的僧人，其中较有名者如曼陀罗僧闍那崛多（智藏）。北周明帝宇文毓武成元年（559年），闍那崛多和同伴知贤等10人，由南疆于阗经吐谷浑到西宁，欲往内地；那时“佛教盛行于鄯州”，僧人们“曾作佛龕于土楼山（今西宁北山）断岩之间，藻井绘画”，成为青海佛教传播的圣地。南禅寺也成为僧人修行地，这里不但有本地的和尚，而且还有印度僧人，如吹菩提羊角等也曾住锡此处。他们在宁期间，一边休整，一边编译佛经、讲经弘法。

这些东西往来僧徒在西宁期间，或住夏，或过冬，讲经说法，弘扬佛法，积极策划建寺建塔，今北山土楼观洞窟壁画和露天金刚造像、大通东峡口摩崖石刻千眼千手佛像，以及互助白马寺山岩下的石雕弥勒佛坐像等多是这时的遗存，尤其北山土楼观洞窟壁画，其装饰性、象征性和写意性，突出显示了北魏壁画的色彩特点。湟中甘河滩镇元山尔出土的“胡僧骑马铁俑”就是宗教徒西来东往的铁证。胡僧大眼、高鼻、深目，“身披袈裟，



出土于湟中甘河滩镇元山尔的胡僧骑马铁俑

颈戴佛珠，双手合十，端坐马上，有浓厚的曼陀罗风格。”这件稀世珍品铁俑是青海道众多高僧大德在西宁地区传法诵经的生动写照。

隋唐两朝帝王大多崇尚佛教，因而成了佛教发展的又一个高潮期，尤其隋炀帝西巡中在拔延山陈兵讲武、金山大宴群臣；唐朝武则天下令将佛教排在各教之前，宣谕各地修建寺院、道观的举措，加速了宗教在河湟地区的传播，这里曾有大律师道宣法师及称为“关中四杰”的道生、僧肇、道融、僧肇等高僧。唐玄宗天宝六年（747年），鸿胪卿兼西平太守哥舒翰收复河西九曲故地后，有名的边塞诗人高适就随同哥舒翰游佛寺、登佛塔，写有《同吕判官从哥舒大夫破洪济城回登积石军多福七级浮屠》的诗篇：“塞口连浊河，辕门对山寺。宁知鞍马上，独有登临事。七级凌太清，千崖列苍翠”，就是河湟地区佛教兴盛的明证。尤其唐宪宗时，吐蕃第42代赞普赤达玛乌冬赞（史称朗达玛）即位，掀起灭佛运动，佛像、佛塔、佛经多被捣毁、焚烧，僧人多被杀，剩下的被流放或为奴，佛教在西藏陷入了灭绝境地。西藏名僧藏·饶赛、肴格迺、玛尔·释迦牟尼三人不甘泯灭佛法，伺机用骡子驮着经卷，潜逃出西藏，一路上风餐露宿，经新疆、河西走廊，辗转来到青海阿琼南宗，后又到普兰央宗躲灾修行。这就是藏传佛教史上有名的“三贤哲”。佛教徒拉隆·贝吉多杰射杀朗达玛后，遭到吐蕃王室的追杀，也曾逃到这里避难，后曾在乐都、尖扎、化隆居住。他们晚年招收的弟子贡巴饶赛继承三师遗愿，广招门徒，弘扬教法，其弟子鲁梅等10人回藏，复燃西藏佛教之火，使佛教再度复兴，称为西藏佛教“后弘期”。史载贡巴饶赛是朵麦地区加入人（今循化积石镇），因复兴西藏佛教之功，公认为是藏传佛教后弘期下弘法始祖，故被尊称为“喇勤”，意为“明白佛教理义的大师”。因为上述缘故，西宁大佛寺、互助白马寺（玛藏观）遂成为藏传佛教圣地，受到各族信教群众的崇敬和朝拜。

北宋时期，由吐蕃王朝皇室后裔唃廝囉创建于西宁的青唐地方政权前后虽只存在了不到百年，但在西宁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唐王朝衰亡后，内地梁、唐、晋、汉、周五代政权先后兴衰，吐蕃王朝也因云丹和兀松各自称王而分裂成为多个割据小国。由于河湟地区远离中原，“中原多



故，王命不及”，占据此地的吐蕃各部在经过多次互相攻伐之后，深深地感觉到河湟谷地最大的威胁来自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为了共同抵御强敌，河湟地区终于出现了一个较大的吐蕃部落联盟，这就是以唃廝囉为首的青唐政权。唃廝囉（997—1065年），是青海历史上一个值得称道的人物，本名欺南凌温，号瑕萨，是吐蕃雅隆觉阿王系后裔。据《宋史》记载，他“绪出赞普之后，生于高昌磨榆国”，12岁时，被在高昌经商的河州吐蕃商人何郎业贤发现，带到河湟地区。由于欺南凌温“貌奇伟”，又具有高贵的赞普血统，当地人便称其为“佛子”，唃廝囉即“佛子”的意思。加之当时吐蕃人“尊大姓，重故主”，唃廝囉特殊的身份很快就引起了吐蕃各部落的关注，不久，便被宗哥（今平安）僧人李立遵等拥立为王。北宋明道元年（1032年），唃廝囉杀死了被宋册封为归化将军的温浦奇，离开邈川（今乐都）西进鄯城，改称鄯城为“青唐城”，建立了吐蕃政权。

据说当年唃廝囉政权的首府青唐城广袤二十里，中有隔墙，分为东西二城。据亲自到过青唐城的北宋绍圣武举人、右班殿直李远所撰《青唐录》记载，青唐城“城枕湟水之南，广二十里，旁开八门，中有隔城，伪主（指青唐主）居。城门设譙楼二重，譙楼后设中门，后设仪门。门之东，契丹公主所居也，西为夏国公主所居也。”西城建有唃廝囉宫室、贵族宅第、佛寺等，还有数千家居民居住在这里。东城则是商品交易场所，住有“陷羌人及陷人之子孙”，还有许多往来的商贩，坐地经商的竟有数百家。李远还对青唐城内部唃廝囉宫室做了详细描述，说过仪门200步是大殿，大殿“北楹柱绘黄，朝基高八尺，去座丈余。碧琉璃环之，羌呼为‘禁围’。”还说首领升殿议事时，奏事者必须立于玻璃墙外，不然即遭诛杀。首领宝座旁设有“金冶佛像，高数十尺，饰以珍珠，覆以羽盖”。如果是国相，必须立于西；如果是国王的亲属，必须立于东。其规矩严格如此。由于吐蕃重僧，凡有大事，国王必须召集众僧共同议决；凡是僧人犯罪，没有不赦免的。因此，青唐“城内之屋，佛舍居半”。这些屋宇中，除了“国主殿及佛舍”上面覆盖着瓦以外，其他的所有房舍，即是国主的宫室“亦以土覆之”。并说，城南大街之西，有个三级的坛，面积达一亩多，每年国王都要

“祭天于其上”。1990年，在今花园南街明代城墙下出土了一批窖藏铜器，有钵、灯、玉壶春瓶、佛教法器 etc 宋代遗物。据考古发现，这里的城墙是建在一座寺院的遗址之上。这也印证了李远在《青唐录》中所说的隃厮啰青唐城“城中之屋，佛舍居半”的记载。《青唐录》中还记载，青唐城的西面“有青唐水（今南川河），注宗河（今湟水），水西平远（指今古城台一带）”，建有佛祠，佛祠群广五六里，并“缭以冈垣，屋至千余楹”。这里还塑有浑身涂有黄金的大佛像，旁边建有高达13层的佛塔，用来保护佛像。青唐城内“殿宇嵯峨，金碧辉煌，梵宫林立，佛像金冶”，可见当时的西宁真是一座高原“佛城”。

据马文慧女士说，伊斯兰教于7世纪中叶传入中国，迄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伊斯兰教在唐代被称为“大食法”，在宋代被称为“大食教度”，蒙古西征和建立元朝以后，伊斯兰教在中国才有了一个较大规模的传布和普遍而迅速的发展，并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互相影响和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文化。据史料记载，早在我国唐朝时期，就有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或波斯人，或经商，或传教，千里迢迢，从陆路来到中国西北地区。到北宋时，就有更多的阿拉伯人或波斯人，还有不少西域商人或传教士来到河湟地区，他们中，有的因贩货或其他原因不时返回，因而被当地人称作“回回”。其中也有很多人来到湟水谷地的青唐城，有的甚至长期在青唐城东城居住，因而成为我省回族的先民。他们和生活在这里的其他人民一起，为开发河湟谷地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成吉思汗率军西征中亚、东欧时，就有不少当地人民参加了成吉思汗的远征军，当成吉思汗率军东返时，这些人被编为“西域亲军”，又配合蒙古大军参与了进攻南宋、进而统一中国的战争。战争结束后，西域亲军中的大部分人被安置在西北地区，由于分布面广，故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称。其中土地肥沃的湟水谷地当时地广人稀，就安置了不少回族人。据史料记载，当时就有一个被称为固图布·兰巴尼·尔不都来·海麻尼的“天方圣裔”，于1273年到云南传教，后辗转来到青海，最后在西宁去世。固图布·兰巴尼·尔不都来·海麻尼去世后，当时元朝驻守西宁的西宁王速来蛮特



地为他在西宁南面的凤凰山上修建了“拱北”，供伊斯兰教徒朝拜。

尽管元王朝统治的时间并不长，但留给西宁的一些寺庙却是“元代古刹”，如西宁市城隍庙就创建于元代，有《元西宁州创建城隍庙碑记》为证。“随着藏传佛教在藏地的盛行，元朝在各级统治机构中僧俗并用，甚至在局部地区直接实行寺僧治民的政教合一的统治”，如《马可·波罗游记》中就写到了当时西宁宗教兴盛的情况：“（西宁）的居民大多数都是佛教徒，也有少数回教徒和基督教徒。当地居民体胖、鼻小，黑发不长须，妇女非常美丽，面目清秀，体态姣好。”马可·波罗是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和商人，他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途经中东，历时四年多到达蒙古族建立的元帝国。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曾访问了当时中国的许多古城，写成的《马可·波罗游记》中不但保存了一些有关西宁的宝贵史料，也是中西方人民友好交流的历史见证。直到明万历时，尚有西天竺（今印度）僧人娑竭运来西宁主持永兴寺，又有印度僧人冷克卜里和独哇加句二人游历中国诸名山之后，来北山永兴寺传播佛教，史载“受戒者甚众”。

明王朝建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在西宁卫设僧纲司，由都纲一职专门管理佛教事务，如为明王朝招降罕东诸部的三罗喇嘛被封为西宁僧纲司都纲，以管理西宁卫宗教事宜，奉诏建成瞿昙寺；开国将领西平侯沐英（安徽省定远县人）为了满足广大穆斯林宗教生活的需要，应回民上层及宗教人士的请求，并奏请朝廷允准，在回民聚居的东关地区动工修建清真寺；西宁土官李南哥感念“三贤哲”使藏传佛教得以复兴的功绩，以西宁土灵塔为基础，建成大佛寺；明都督史昭认为西宁是河西巨卫，山谷险阻，风气亢然，必须实行“教先于政”的政策，才有利于地方的安定和国家的统一。为此，他上奏“请建孔庙，开学校，举屯田”，请设学校如中土，修建文庙和儒学；一般来说，敬神就会建佛祠，敬祖当会建家庙，家庙是汉民间民俗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据《西宁府新志·祠祀·祠庙》记载：“明以前西宁无祠，自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始敕建启圣公祠”，始有祠庙。大佛寺、铁佛寺、西宁文庙和东关清真寺、普仁寺、甘露庵、莫氏宗祠等一批寺庙祠观的建成，形成了西宁卫汉文化、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

等多种文化并存的局面。加之朝廷有意“择番僧中为番所敬信者，创立寺宇，封以国师、禅师之职”，促成了许多寺院的建立。因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兴盛，西宁和周边庙观名刹林立，僧侣众多。据《西宁志·祠祀》记载，明代西宁和周边仅寺院就有华藏寺、高台寺、铁佛寺、永兴寺、弘通寺、卧佛寺、宁番寺、藏经寺、觉化寺、崇法寺、普仁寺、演教寺、吉祥寺、静宁寺等 35 座。

清王朝入主中原以前，就与西藏宗教上层人士有着较密切的联系，后由于加强维护蒙古、西藏与朝廷关系等种种考虑，藏传佛教格鲁派受到皇室的高度尊崇。顺治五年（1648 年），东科寺建成；顺治七年（1650 年），河湟谷地的郭莽寺建成；其他一些元明间早有的寺院也得到重视，陆续得到拨款修缮，“宽恤之政，度越前古”。之后又先后建成西宁雷鸣寺、葆宁寺、崇兴寺、普济寺、九华寺、甘露庵、广济寺、正觉寺、印心寺、塔院、广嗣宫等；来河湟布教的内地汉僧著名的有佛敏、旭止、心道、源森、南佛山苏道和印光、心道、天真，僧尼尘空、广增等。正如蒲文成先生所说，河湟汉传佛教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儒、释、道并重，信仰者主张“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善于寻找三者的共同点，体察人性共有的善的本性，极力除去欲望障蔽，把保持和发扬人类本性固有的东西作为修养的目标。据清乾隆《西宁府新志》记载，当时就有番寺 38 座，汉传佛寺 44 座。

天主教传入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史载早在唐贞观年间，就有天主教的一个派别——聂斯多里派传入我国西北的陕西一带，称为景教，流行 200 多年后自行湮灭。后到元朝时又曾一度传入，不久又中断。明万历十年（1582 年），天主教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华传教，与当时的礼部尚书徐光启等交往甚密，并领洗入教，并在北京建立教堂。清王朝尊崇佛教，而对于天主教的势力渗透十分警觉，雍正皇帝曾下令，禁止外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当初皇九子胤禔充军西宁时，美其名曰到“军前效力”。胤禔离京时曾邀请葡萄牙籍天主教神甫穆经远陪他一同来西宁，从此开了天主教传入西宁之始。胤禔以戴罪之身，携天主教神甫去西宁这件事，本



身就引起了雍正皇帝更大的不快。在此之前，清宗室多罗贝勒苏努全家笃信天主教，苏努之子勒什亨在雍正元年（1723年）曾任传卫内大臣之职，清廷曾派他来西宁催收允禔的罚款，因其借故拖延，拒不到西宁，被清廷革职。勒什亨之弟乌尔陈对哥哥的处罚流露不满，都被清廷发往西宁。乌尔陈从北京动身前，受洗入天主教，勒什亨到西宁后也受洗入天主教，引起雍正的警觉，雍正三年（1725年），他命都统宗楚前往西宁，以就近管束胤禔。都统宗楚等将清皇族中三个贵族入天主教，并在西宁朝阳等地传播天主教教义的事密奏雍正，雍正四年（1726年）四月，雍正又下旨将胤禔废为庶人，押解回京，改名“塞思黑”（意为猪），移送保定禁所，不久即被处死在那里；穆经远以“结党构逆”罪当时亦被押解回京，次年被处以绞刑；西宁右卫将军申穆德奉命逮捕勒什亨、乌尔陈兄弟及其家属，并押解送回北京，勒令他们退出天主教，勒什亨、乌尔陈之父苏努被革去多罗贝勒的爵位，家资被没收，其家属又被充军西宁。天主教传入中国，又一次就以这样的结局告终。

英国籍基督教传教士胡立礼夫妇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来到西宁，开创了基督教传入青海之始。宣统二年（1910年），天主教甘肃甘北传教区比利时籍神甫康国泰等来西宁，又在兵部街创立天主堂，随之向邻近县扩张。天主教和基督教在西宁传经布道期间，赈济灾民，开设培英小学和光华小学，开办公教医院，为促进西宁地区当时十分落后的教育和卫生事业还是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历史的长河永不停歇，人类知识的积累也永不停歇，建筑工艺和制作工艺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和更新，留住祖辈的古迹，既可缅怀先辈筚路蓝缕的艰辛历史，也是展示故土过去辉煌的资本。它将潜移默化地培养后一代热爱家乡的感情，也将会进一步激励我们继承先辈优良传统，去描绘更新更美的蓝图。但历史的发展不会永远一帆风顺，风平浪静，总会遇到激流险滩，颠簸起伏。尽管西宁及周边寺庙祠观作为历史古迹，在今天看来，给我们保留了许多佛（神）像造型艺术的珍品，其雕梁画栋、斗拱飞檐的建筑，大量经籍卷帙、文物和金石碑刻，不但展现了历代大师和能工巧匠